



民国国学文库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荀子

叶绍钧 选注
宛志文 校订

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荀子

XUN ZI

叶绍钧 选注

宛志文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荀子 / 叶绍钧选注 ; 宛志文校订. — 武汉 : 崇文书局, 2014. 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43-7

I. ①荀… II. ①叶… ②宛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395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荀子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5.2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43-7

定 价:14.8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 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已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 言

一 荀子略传

荀子，名况，字卿^[1]，战国时赵人，生当公元前 335 年前后，死当公元前 235 年前后^[2]。他青年时代曾游燕国。齐湣王的末年，他游学于齐国，已是五十岁了^[3]。齐国当威王、宣王的时候，延致天下贤士很多，到这时候死亡殆尽；所以当齐襄王时，他“最为老师”^[4]。后来游秦国，见秦昭王同应侯^[5]，没有什么意思。又到赵国，议兵于赵孝成王前^[6]；但也不能有所施为。末了游楚国。那时候春申君当国，使他作兰陵令^[7]。后来春申君为李园所杀，他就废官。年命差不多要完了，有所施为是无望了，遂从事著作。不久就死在兰陵。

二 荀子书

刘向校书叙录说：“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，以相校，除复重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二十二篇。”^[8]题名为“新书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《孙卿子》三十二篇^[9]，又赋家孙卿赋十篇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唐书·艺文志》都载《孙卿子》十二卷，又都有荀况的别集。《唐书·艺文志》另有杨倞^[10]注《荀子》二十卷。杨倞是第一个

注《荀子》的人。他的序文说：“……独《荀子》未有注解，亦复编简烂脱，传写谬误。虽好事者时亦览之，至于文义不通，屡掩卷焉……辄用申抒鄙思，敷寻义理，其所征据，则博求诸书……以文字繁多，故分旧十二卷，三十二篇，为二十卷。又改《孙卿新书》为《荀卿子》。其篇第亦颇有移易，使以类相从云。”^[11]这是《荀子》结集成现在的样子的略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孙卿赋十篇，当即指三十二篇中的《成相篇》《赋篇》而言^[12]，因为别立赋家，所以抽出来重复记着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等既录《孙卿子》，又有荀况的别集，也是同样的办法。直到杨注出来，给与研求的人不少的便利，于是未经杨惊编订的十二卷本以及荀况的别集自然归于淘汰了。

直到清朝乾、嘉年间，校勘古书的风气大盛，所用校勘的方法都是极严密的，最不取孤证同武断。这当儿，注意《荀子》的人自然也多起来了。于是杨惊注的《荀子》又经过许多学者的修订，义理更见明白。清末，王先谦作《荀子集解》一书^[13]。胡适说整理国故有三途，其中之一叫做“总帐式的整理”^[14]。王先谦的工作，正是结的从前人校释《荀子》的帐。他的校勘依据各种本子，“择善而从”。采集郝懿行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汪中、刘台拱、卢文弨、顾广圻、陈奂等各家解释的说数，往往加以判断；而他自己也有所发明，又附载关于《荀子》一书的考证，差不多搜集得周遍了。所以我们研究《荀子》，以《集解》为最精善最适用的

本子。日本久保爱作《荀子增注》^[15]，用宋本元本来校勘，颇足供参证。服部宇之吉编《汉文大系》，第十五卷是《荀子》，就把《集解》同《增注》合在一起，又加入了猪饲彦博的《补遗》。

不论什么古书，往往是这样子：题名是谁作的，其实未必完全出于谁手；弟子的记录，类似的言论，常与作者的原著一同被包在一个书名之下。《荀子》这部书也是这样的情形。如《大略》《宥坐》等篇，显然是语录同杂记一类的东西。又这部书最初经刘向的结集，已加编排的手续，直到杨倞，中间未必不再经几回的编排。因编者识力的关系以及凑足篇数的关系，编排得不能尽惬当自是难免的事。如《非相篇》的后两章与“非相”无干，《天论篇》的末段与《天论》无干，都由于这等的原因。胡适说：“大概《天论》《解蔽》《正名》《性恶》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。”^[16]或者这几篇才是荀子以著述的态度特地写下来的吧。

三 学术思想概况

《史记》不载荀子所从受学。汪中作《荀卿子通论》，考见荀子对于《易》《礼》《毛诗》《鲁诗》《韩诗》，左氏《春秋》、公羊《春秋》、谷梁《春秋》不是有授受、解释的明据，便是有牵联、关系的痕迹^[17]。因此说：“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，而古籍阙亡，其授受不可尽知矣。”荀子做的学问既尽是儒家的学问，又这样地广博，自然自己也立脚

在儒家的一面。可是，当他的时代，所谓“七十子之徒”已是过去了，儒家很有点衰败的样子了。而他所谓“足以欺惑愚众”的学说^[18]，却沸沸扬扬到处流传。这怎能教他不要忧心呢？于是申述他完全自得的中心思想，同时批评他家的思想、驳斥他家的思想^[19]，希望移易当时的人心。他的弟子有李斯、韩非，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。又有浮丘伯同张苍，一个是受《诗》的，一个是受左氏《春秋》的。更从他与诸经的关系讲，简直可说汉代的学术都源于他。总之，他是为儒家放异彩的一位大师，是诸经传授的一位肩荷者。

荀子的自得的中心思想，不能不推他的针对孟子“性善说”的“性恶论”。他的口号是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”^[20]。他以为人的天性有种种的情欲，若令顺着情欲做去，就会做出恶事。可见人性本恶。因此，必须有种种人为的礼义法度来节制它、来利导它，方才可以为善。可见人的善行，全赖人为。这个观念应用到政治哲学上边，就成“礼治主义”。他说：“今人之性恶，必将待师法然后正，得礼义然后治。”^[21]何以能“正”？何以能“治”？就因为“师法”同“礼义”不是顺性的而是特地定出来裁制性的东西，性恶这个观念应用到教育哲学上边，就成“积善主义”。他说：“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，谓之圣人。彼求之而后得，为之而后成，积之而后高，尽之而后圣。故圣人也者，人之所积也。”^[22]人本来没有善，犹如穷人一个钱也没有。但是一个积起来，积之不休，到极其充足的一天，就是富翁了。

积善积到这地步，就是圣人。每个穷人都能成富翁，只要能积钱；每个人都能成圣人，只要能积善。性恶这个观念应用到人生哲学上边，就成“明心主义”。他说：“心者，道之工宰也。”^[23]又说：“故心不可不知道。心不知道，则不可道而可非道……心知道，然后可道。可道，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。”^[24]要能知道而以道为可，才是清明的心。怎能使心知道呢？他有“虚一而静”四个字^[25]，就是先要做到虚心、专一、静心三种工夫。心既清明，所可中理，就不会顺着情欲做出非道的事情来了。

要礼治，要积善，要明心，纯任自然是办不到的，必须努力作为，多一分功力就多一分效果。所以他极看重后来被误解而累他受冤枉的一个“伪”字。这是荀子哲学的特色，他把老、庄任天的观念，墨家信天的观念都辟开了，干脆干脆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在人的肩膀上。于是发生他的“天论”，自然主要是“不求知天”，但欲征服天行以为人用了^[26]。

荀子所说的“伪”，在圣人方面是为民众制定礼义。他说：“礼义者，圣人之所生也。”^[27]又说：“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。”^[28]在民众方面，所谓“伪”便是努力学习，把礼义积聚在自己的身上。他说：“今人之性，固无礼义，故强学而求有之也。”^[29]圣人所制定的礼义差不多是民众永久的标准，因为圣人是通乎古今，最善推度的。他说：“圣人者，以己度者也。故以人度人，以情度情，以类

度类，以说度功，以道观尽。古今一也。度类不悖，虽久同理。”^[30]古今既是一致，似乎都不妨效法，但是他不主张“法先王”而主张“法后王”。他的意思，并不是说先王不好，也不是说先王与后王有什么不同，只因为后王的时代近，他的礼法制度更是明白可考。所以他说：“欲观圣王之迹，则于其粲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”^[31]

这种标准圣王、古今一致的观念，从思想方法上讲，完全是演绎法。所以他说：“凡议，必将立隆正，然后可也。无隆正则是非不分，而辨讼不决……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。”^[32]只要把圣王的礼法制度作为“隆正”，作为大前提，为是为非的结论便不至于差误。根据这个来正名，自然主张“必将有循于旧名，有所于新名”^[33]了。

荀子因论明心而论到心理现象^[34]，于是跨入了心理学的界域。又因论正名而论到“所为有名”、“所缘以同异”以及“制名之枢要”^[35]，于是跨入了认识论的界域。在儒家，他以前的儒家，从没有探求得这样深而描写得这样细的。这是可以注意的。

四 余语

研究学术思想，不论是古人的或是现代的，首要在确知它的真相；更进一步，就拿来作我自己研究学术、完成思想的参证。所以主观的态度是不相宜的，拘泥的性习是没有好处的。譬如从前人因荀子主张性恶，就对他不满意，以为他

无论如何，至少要比孟子低一级。这由于他们主观得厉害，拘泥得厉害，故而想着性总该是善的才对。我们现在就不这样，性到底是善是恶的问题且搁在一旁，却觉得孟、荀二人同样是混用抽象名词来说话的人。陈登元作《荀子之心理学说》^[36]，罗列两家的说数来比核，他的答案是“孟、荀二家皆主心善。荀子性恶之性，非孟子性善之性。”试读《解蔽篇》论心的文字，与孟子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”的话对照，他们两个人确然在一条路上。荀子说性恶，每指情欲而言，孟子说性善，却指“我固有之”的良心，用词不同，显然可见。那么，从前人扬彼抑此，不是无聊的争辩么？这是说客观的态度的必要。

又如我们既知道孟子说性善，荀子说性恶，其实他们两家都说的心善，这当儿最要记着“孟子说”“荀子说”这几个字。记着这几个字就与“我信”不同。固然，如孟、荀两家在我国学术思想上都发生伟大的影响，或且直到无尽的将来。但“食而化之”是可以的，“酌而采之”是可以的，研究某说即“我信”某说是不可以的，因为这样就把你的进程阻挡住了。在现在的时代，要研究哲学、教育、心理等科，应当从现代的哲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等入手；古代的呢，都只给我们作参证的材料，这才会有永永进展的希望。这是说融通的性习的必要。

编者编完了这部书，谨将所怀的一点意思写在前面，以贡献于读者。

[1]《史记》称荀卿，刘向校书叙录同应劭《风俗通》却称孙卿，《荀子》里边多自称孙卿子。为什么一个人有了两个姓呢？司马贞、颜师古等都说汉宣帝讳询，故改荀为孙。谢墉作《荀子笺释》，于序文中驳此说道：“考……汉时尚不讳嫌名。且如后汉李恂与荀淑、荀爽、荀悦、荀彧俱书本字，讎反于周时人名见诸载籍者而改称之？若然，则《左传》自荀息至荀瑶多矣，何不不改耶？……盖荀音同孙，语遂移易。如荆轲在卫，卫人谓之庆卿，而之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”此说有这样坚强的反证，避讳说当然不能成立；而所以一姓异字的原由，也可因此恍然了。又《史记》单称荀卿，没有说明卿字是名是字，刘向校书叙录说“孙卿，赵人，名况”，也没有说明卿字是什么。后人多说卿字是尊美之词。直到江璩《读子扈言论荀子之姓氏名字》一文，始断定卿字是荀子的字。他的证据很坚强。他说：“刘向叙曰：‘兰陵人善为学，盖以孙卿也。长老至今称之，曰兰陵人喜字为卿，盖以法孙卿也。’此为荀子字卿之确证。刘向不言‘兰陵人喜名为卿’，而曰‘喜字为卿’，则卿为荀子之字可知。”

[2]《史记》载荀子死于春申君死后。春申君为李园所杀，在楚考烈王二十五年，当公元前 238 年。那么荀子的死，当在公元前 235 年前后，没有什么可疑。独有对于他的生年，从前人有种种不同的推测，不易确定谁是谁非。但是有一条线索在这里，依着

推求，实也不见得难定。《韩非子·难四》篇有句话道：“燕王哙贤子之而非荀卿，故身死为谬”。韩非是荀子的弟子，述及老师的事情决不至于差误，可见荀子当燕王哙未死之前，曾到过燕国。燕王哙死的那年是公元前314年。而能够到别国去想有所发展，至少须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。据此上推，故说荀子的生年在公元前335年左右。下推到齐襄王元年，当公元前283年，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所以齐襄王时他最为老师，其间时距亦很吻合。只是这样说来，他的年寿到一百岁以外，似乎有点奇特。但是古往今来并不是没有百岁以外的人；并且按照他的事迹，须要这样说去方通，我们只得认他是个享年极高的人了。

[3]《史记》本传称“年五十，始来游学于齐”。刘向叙录称“方齐宣王、威王之时，聚天下贤士于稷下，尊宠之，若邹衍、田骈、淳于髡之属甚众，号曰列大夫，皆世所称，咸作书刺世。是时孙卿有秀才，年五十，始来游学”。后人不察刘向的差误，觉得荀子的年岁太长了，以为“年五十”当是“年十五”。胡适作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辨正此说最有理。他说：“不知本文说的‘年五十始来游学’，这个‘始’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。若是‘年十五’，决不必用‘始’字了。” [4]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叙述荀子，于“始来游学于齐”下接“驹衍之术，迂大而闳辩。爽也文具难施。淳于髡久与处，时有得善言。故齐人颂曰：‘谈天衍，雕龙奭，炙毂过髡’”，共四十一字。往下乃说“田骈之属

皆已死。齐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”。胡适对于“驺衍之术……”四十一字以为“这一段不相干的事实，乃是上文论‘齐有三驺子’一节的错简。”这自是极确切的；我们试把这一段补入上节，文义都合。胡适又说“齐襄王时”四字应属上读，因为“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个‘状时的读’；状时的读与所状的本句决不可用‘而’字隔开，隔开便不通了。”依此说，“齐襄王时”与“为老师”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，《史记》一书颇有类似的不通句子，陈登元作《荀子传略》（见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所出《国学丛刊》第二卷第一期）曾举出《孔子世家》中“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”及“鲁昭公之二十二年，而孔子盖年三十矣”两例。可见用文法来解决，未必一定可靠。又况这四字如属上读，势必把荀子的生年排后，那么又何以解于韩非的话呢？所以我们还是从旧时读法，把这四字属下。 [5]《荀子·儒效篇》载秦昭王与荀子问答的话。《强国篇》载应侯与荀子问答的话。 [6]《荀子·议兵篇》载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的话。 [7]荀子作兰陵令在楚考烈王八年，当公元前 255 年。 [8]现在把篇目抄录在这里：《劝学篇》第一，《修身篇》第二，《不苟篇》第三，《荣辱篇》第四，《非相篇》第五，《非十二子篇》第六，《仲尼篇》第七，《成相篇》第八，《儒效篇》第九，《王制篇》第十，《富国篇》第十一，《王霸篇》第十二，《君道篇》第十三，《臣道篇》第十四，《致仕